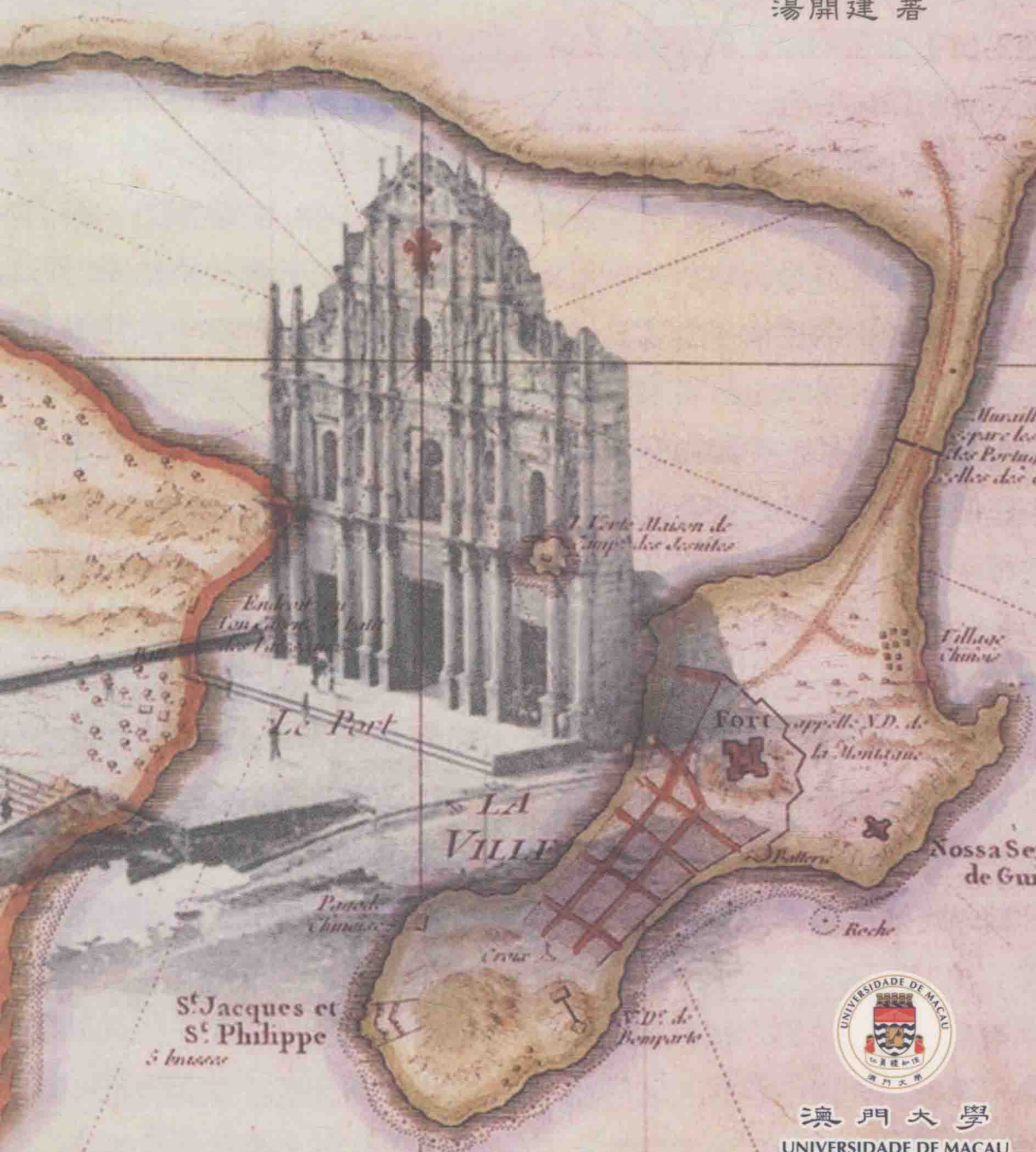


澳門學研究叢書

明清天主教史論稿初編

—— 從澳門出發

湯開建 著



澳門大學

UNIVERSIDADE DE MACAU
UNIVERSITY OF MACAU

明清天主教史論稿初編

——從澳門出發

湯開建



澳門大學
UNIVERSIDADE DE MACAU
UNIVERSITY OF MACAU

2012

明清天主教史論稿初編

——從澳門出發

作者：湯開建
封面：天覓意念有限公司
統籌：澳門大學出版中心
出版：澳門大學

澳門氹仔徐日昇寅公馬路

電話：(853) 2883 1622

網址：www.umac.mo

傳真：(853) 2883 1694

電郵：pub.enquiry@umac.mo

承印：嘉華印刷公司

出版日期：2012年11月，初版

印量：500冊

**A History of Catholicism in China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Volume 1:
Starting out from Macau (in Chinese)**

Authored by TANG Kaijian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Macau

Avenida Padre Tomás Pereira, Taipa, Macau, China

Tel: (853) 2883 1622

Fax: (853) 2883 1694

Website: www.umac.mo

Email: pub.enquiry@umac.mo

Published and printed in Macao.

© 澳門大學 / Universidade de Macau / University of Macau, 2012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9965-1-034-2

明清天主教史論稿初編

——從澳門出發

澳門學研究叢書

叢書編委會

主 編 郝雨凡（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

副 主 編 湯開建（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歷史系）

編 委 （依姓氏筆劃排列）

王國強（澳門大學圖書館）

朱壽桐（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中文系）

林玉鳳（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傳播系）

林廣志（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

郝志東（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社會學系）

姚京明（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

楊秀玲（澳門大學校長辦公室）

楊開荆（澳門基金會）

鄧駿捷（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中文系）

魏楚雄（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歷史系）

關 鋒（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經濟系）

龔 剛（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中文系）

自序

早些年的歐洲漢學家都喜歡談天主教在華傳播史研究的“範式轉換”問題，國內亦有不少學者跟進，這樣的呼喊一度很時髦。在他們的視野中，似乎天主教會史及傳教史的研究已然過時，或者說只是一種低層次的研究，甚至將傳教史、教會史的研究完全歸結於所謂“歐洲中心觀”的產物。我很不贊成這些將事情敘述複雜化而結論上又是十分簡單的理論分類。我並不想對“歐洲中心觀”與“中國中心觀”的區分及轉換發表意見，更不想在天主教研究中的“自我”與“他者”的概念變換中做文章。但我堅持一點，任何歷史研究，最根本的問題取決於材料。雖然在我們現今的天主教史研究中存在著以西方材料為主和以中文材料為主的兩種現象，但這一狀況的存在是由於研究者們學識能力的局限造成的，是一種無可奈何的處理方式，並非有意去製造一種“歐洲中心”或“中國中心”。因為早期的西方學者大都不通中文，而中國學者掌握和運用西方語言的能力實在有限。故我們希望看到的是能真正將16-18世紀有關東、西方各類語言的天主教史資料融會貫通，互證互補，並在這一基礎上對中國早期天主教史做出一個較為系統、清晰的認識。

的確，明清天主教史研究是一門很難的學問，對學者的史學功底、語言能力、場景思維的轉換能力都要求極高。歐洲已經出現了像謝和耐、許理和、鐘鳴旦、杜鼎克等一批熟悉中西語文的天主教史家，在中國卻尚未產生，這是不爭的事實。要培養和訓練出一些能同時充分利用拉丁、意、葡、西、荷、法、德、英等語言文獻的中國專家，我估計還需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雖然掌握一兩種西文的中國專家投入到天主教史研究中者並不少，但還遠遠不夠，一是掌握的語言種類太少，二是對各語種文獻的開掘和翻譯不足。雖然我們不斷地強調中國早期天主教史研究要將中西史料同時並舉，但不可否認的是，天主教在華傳播史中主要的史料構成是西文多語種史料，而不是中文，中文史料往往只是在研究中國天主教徒的身份、履歷，中國天主教徒對天主教的認識及反教運動的過程等幾個方面表現相對重要。實際上許多修會的在華活動幾乎無中文資料記錄。但，新近發現與挖掘出來的利瑪竇的朋友明韶州同知劉承范《利瑪傳》卻在一定程度上衝擊了我的認識。所以，在中國早期天主教史研究中，傳教史的研究及對各種西方語言文獻檔案的發現和利用仍是一個最基礎的問題，只有通過對個別地區、個別修

會、個別教案、個別人物的專門研究，才有可能將這些沉寂湮沒在梵蒂岡、巴黎、馬德里、里斯本等地的各修會檔案館中的多語種西文檔案發掘出來。基本的傳教史實都搞不清楚，基礎的文獻史料絕大部分還不為研究者認知，就奢談什麼“理論模式”、“轉換範式”，我很擔心，中國天主教史的研究很有可能重蹈我國20世紀50年代後中國歷史研究之覆轍。這種離我們並不遙遠的教訓，不應重演，不管是西洋式，還是中國式。

正如我在2006年為崔維孝博士的著作¹所作的序言中提到的，研究中國天主教史，中國的專家應走在這一學科的前沿，這應是理所當然，且義不容辭。而要走到中國天主教史研究的前沿，兩條腿走路的方針必不可少。一條腿必須堅實地站在中文檔案文獻的基礎之上，另一條腿則要邁進浩瀚無涯的各種西語檔案文獻的海洋之中，缺一不可。如今五年過去了，國內學者能真正會通中西、用兩條腿健步如飛者，仍不多見。我想，此事大概不能急於求成。可惜的是，在兩條腿走路的方針上，我自己也是一腿長一腿短、深一腳淺一腳地蹣跚而行。雖然在中文資料的整理與研究上我還有一定的自信，但外文資料的發掘與利用則是依靠他人翻譯這一支“拐杖”來完成。所幸的是，幫助和支撐我的這支“拐杖”可以說是一支強大的翻譯隊伍，既有學術界的朋友，還有一批學生。葡文有金國平、李長森、田渝、彭蕙；西班牙文有崔維孝；法文有劉清華、韋羽、劉芳；英文有趙殿紅、陳玉芳；日文有戚印平、劉小珊。他們或提供譯文，或直接幫助我翻譯。特別是金國平先生大批量翻譯16-18世紀的葡文文獻等葡文檔案，甚至將其未出版的《西方澳門史料選萃（17世紀）》譯稿無償提供給我使用。戚印平先生亦是如此，其《澳門聖保祿學院及耶穌會在東方的教育機構》的未刊稿亦交由我使用，我又組織了幾位我的博士生及澳門大學葡文系的研究生展開了對《耶穌會士在亞洲》葡文檔案的翻譯，這樣使我在外文史料的採擷上更上層樓。此外，近些年出版了許多新的外文材料的中文翻譯，對我的研究幫助不小。如果說我這部書稿於中國天主教史研究還有一點貢獻的話，則其中一半功勞應歸於他們。

這本集子是我出版的第一部天主教史研究論集，其中精選11篇論文。大部分文章都與澳門相關，故題書名為“從澳門出發”，一是寓意中國天主教是從澳門起步，二是說明中國天主教的發展興衰均與澳門相關。上述論文大都於20世

¹ 崔維孝：《明清之際西班牙方濟會在華傳教研究（1579-1732）》，中華書局，2006年。

紀末及本世紀初發表於臺灣及國內的刊物上，每篇論文都很長，故在發表時受雜誌社字數的限制，多篇論文都是分成幾篇文章發表，此次出版集子時，重新進行了整合與修訂，有些文章修改量還相當大，主要是增補近幾年翻譯出版的新資料。這次出版雖然是整理和修訂舊稿，但耗去的時間依然很多，修訂文字，重新打字，統一體例和注釋，繁瑣之極，賴博士生晏雪蓮同學日以繼夜的辛勤勞作，精心校對，終於能將其付梓。在此，謹向晏雪蓮同學表示衷心的感謝。文稿完成後，又請趙殿紅博士通讀全稿，再進行一次全面的校訂及統一體例，亦付出了很多勞動，在此亦表示感謝。另外，此書稿的基本內容來源於我2002年申請的教育部課題《16-18世紀澳門與中國內地關係研究》，這次出版時改了書名，在此一併說明。

湯開建

2011年12月1日於澳門氹仔

目 錄

自序	1
明清之際澳門天主教的傳入與發展	1
一、基督教第三次入華與澳門主教區的創立：1555-1576	1
二、天主教修會紛紛駐足澳門	8
三、本土教堂教友的迅速發展	14
四、澳門——遠東各國的傳教基地	20
明清之際澳門與中國內地天主教傳播之關係	25
一、明清之際澳門是傳教士進入中國內地最重要的渠道	25
二、澳門是中國內地各天主教修會傳教的後勤供應站	32
三、澳門是中國內地天主教傳教事業培訓人才的最重要基地	38
四、澳門是中國內地民眾信奉天主教的進教地	51
五、澳門是中國內地天主教傳教士的療養院與庇護所	57
明季寓居澳門的日本基督徒及廣東政府的管治與防範	64
一、明季進入澳門的日本基督徒	64
二、廣東政府的“防倭”及與澳門的衝突	72
三、明季廣東政府對澳門日本基督徒的管治與防範	81
四、結語	89
明清之際天主教在海南的傳播、發展與興衰	93
一、天主教在海南的興起	93
二、天主教在海南的發展	97
三、康熙時期海南的天主教	103
四、雍正禁教後海南天主教的衰落	107

明清之際甘青地區天主教傳教活動鉤沉	110
一、明末清初進入甘青地區的耶穌會士	110
二、康熙後期義大利方濟各會士與甘肅天主教的發展	119
三、雍乾時期的禁教對甘肅傳教的影響	125
明清之際方濟各會中國傳教事業考略：1579-1722	137
一、明末方濟各會在中國東南沿海的活動	138
二、順治時期方濟各會的山東開教	144
三、康熙前期西班牙方濟各會士在全國各地的活動	149
四、康熙後期義大利方濟各會士在西北地方的傳教	159
順治時期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	170
一、順治時期清政府的保教與尊教政策	170
二、順治初期中國天主教事業的保存與重建	176
三、順治中後期中國天主教事業的迅速發展	183
明清之際中國天主教會傳教經費之來源	211
一、各修會宗主國、修會總會及教廷的資助	212
二、澳門各界及國內教友的捐贈	218
三、中國政府的賞賜及任職傳教士的俸祿	222
四、借貸收租，參與經貿活動	225
五、結論	230
明清之際天主教藝術在澳門及中國內地的傳播	232
一、澳門是天主教藝術傳入中國的發祥地	232
二、天主教藝術在中國內地的傳播	240
三、天主教傳播與西洋宗教畫的關係	250
明清之際天主教音樂在澳門及中國內地的傳播	264
一、天主教音樂在澳門的傳播	265
二、天主教音樂在中國內地的傳播	272

明清之際耶穌會的鐘錶外交與西洋鐘錶的傳播	288
一、耶穌會的“鐘錶外交”	289
二、明清宮廷西洋鐘錶的仿製與生產	296
三、西洋鐘錶在民間的仿製	302
四、廣州市場的自鳴鐘貿易	311
五、餘論	316
人名譯名對照表	318
徵引文獻書目	337
附圖	353

明清之際澳門天主教的傳入與發展

文德泉神父稱：“16世紀末葉，天主教在澳門和中國迅速發展，這種進步一直繼續了整個17世紀。”¹從16世紀中葉澳門開埠到17世紀末這百餘年間，雖然澳門城市的發展經歷過興衰起伏的曲折歷程，但天主教在澳門這百餘年間卻一直處於持續發展之中，成為澳門天主教發展史上的“黃金時代”。在這百餘年間，澳門一直是中國內地天主教傳播的最重要的基地。完全可以說，在中國天主教傳教史上，沒有澳門就沒有中國的天主教，足以反映澳門天主教在中國天主教史中的重要地位。然而，在研究中國天主教史逐漸成為人們關注的“顯學”時，澳門天主教自身的發展問題卻甚少人關注。本文擬在全面搜集中西史料的基礎上，對明清之際澳門天主教的傳入與發展這一問題展開較為深入的探討。

一、基督教第三次入華與澳門主教區的創立：1555-1576

基督教第三次入華之標誌，按照教會人士及一般教會史的研究，均認定為1552年沙勿略在上川島的活動。西班牙人沙勿略 (François Xavier) 是耶穌會會士，作為教廷去印度的遠東使節，他於1541年從里斯本出發，到達果阿 (Goa)。1549年他到日本傳教，發現日本文化深受中國影響，他認為不如先到中國傳教，以促進天主教在日本的傳播。於是，他於1551年12月乘船抵廣東的上川島。沙勿略從此前往麻六甲，籌劃由印度總督遣使入朝中國皇帝，以取得在內地傳教許可的計劃，但此計劃因受阻而無法實現。他於1552年8月抵達上川島，成為第一位進入廣東傳教的西方傳教士。此時，中國沿海不僅有日益嚴重的倭患問題，而且還有新來的葡萄牙侵略勢力的威脅，中國明朝廷加強了“海禁”政策的執行。由於沒有中國皇帝的“勘合”²，沙勿略無法名正言順地進入內地，他只有想方設法冒險潛入。據沙勿略1552年10月22日寫於上川的一封信稱：

多虧我主的慈悲、憐憫，迪奧戈·佩雷拉 (Diogo Pereira) 的大船及所有乘客安全無恙地來到了上川港。在此我們遇到了許多其他商人的船隻。上川港距廣州三十里格。許多商人從廣州城趕來此地與葡萄牙人交易。葡萄牙

¹ 文德泉《耶穌會士於澳門開教四百周年》，頁8。

² 勘合，為明朝政府頒發給外國進貢船隻的一種符契印信。

人不斷與他們打交道，看看是否有人願意帶我去廣州城。眾人一致拒絕，他們說若廣東督臣得知帶我入城，他們的性命及貨物將遭受極大危險。因此不管我開多大的價，他們也不敢讓我隨他們的船去廣州城。³

雖然最後有一個廣州商人答應沙勿略以 200 克魯割多的代價用小船將他搭載至廣州城，但約定的廣州商人未來踐約。沙勿略一行一到上川島，就在此設立教堂，並進行宗教活動：

初抵上川我們便建立了一所教堂，直到我染上熱病病倒為止，每天作彌撒。我病了十五天。現在托上帝保佑，已痊癒。我的聖功不知耽誤了多少，如作懺悔、探望病人、談心交友。我實在不知寫甚麼好，但我們入華的決心堅如磐石。所有見到我們的華人，都是誠實的商人，對我們的舉動感到高興並希望我們前往中國。他們以為我們寫在書上的聖法比他們信奉的道法為佳，也許他們是出於好奇。眾人興致頗高，但無人願意冒風險引導我們前往。⁴

與他一起呆在上川的中國修士安東尼奧·曼努埃爾·特謝拉 (António Manuel Teixeira) 的信中對此也有記載：

法蘭西斯科神甫一抵達此地，便請求葡萄牙人看在上帝的份上讓人給他建立一座草棚小教堂，以便可以在裏面作彌撒和教那些被捕的兒童、少年學習教義。儘管人數不多，但他向他所到之處那樣非常有愛心地把教他們。他為許多人作懺悔。此項工作佔據了他全部時間。他為窮人化緣，與來那裏貿易的華人異教徒交往。不是傳播教義，而是拉家常。談論的題目通常是哲學，例如世界的構成及諸如此類的問題。他的回答令華人信服。他們逢人便說，法蘭西斯科神甫看上去似乎是智者、來歷不凡。⁵

上川島的傳教事業雖然很小，但沙勿略在這裏建起了教堂，並有隨他學習並聽從他傳教的“兒童、少年”。沙勿略在一邊等待廣州商人踐約的同時，還曾設

³ 格奧爾格·舒馬赫梅爾《方濟各·沙勿略通訊錄》。轉引自金國平《西方澳門史料選萃：15-16世紀》，頁62。

⁴ 格奧爾格·舒馬赫梅爾《方濟各·沙勿略通訊錄》。轉引自金國平《西方澳門史料選萃：15-16世紀》，頁63。

⁵ 格奧爾格·舒馬赫梅爾《方濟各·沙勿略通訊錄》。轉引自金國平《西方澳門史料選萃：15-16世紀》，頁69。

想先去暹羅，以便在那個商人不能帶他進入內地的情況下，他可以隨暹羅國王派遣出使中國國王的使團入華，在他 1552 年 10 月 22 日寫給滿刺加迪奧戈·佩雷拉信中說道：

萬一今年無法入華，我不知是否同迪奧戈·瓦斯·德·阿拉貢 (Diogo Vaz de Aragão) 一道乘坐他今年在此購買的一條平底帆船前往暹羅，然後從暹羅隨暹羅國王遣華使團入華。若我前往暹羅，我會通過曼努埃爾·查維斯給您寫信。若您可通過甚麼途徑往暹羅發信，一定給我寫信，告訴我您明年的打算，是否與使團入華，以便我們在廣海或廣東其他甚麼港口會合。⁶

這在他寫的幾封信中多次提到。然而不幸的是沙勿略身患重病，於 12 月 3 日黎明前去世。⁷

與其同來的耶穌會傳教人員，還有以下幾位：葡萄牙人阿爾瓦羅·費雷拉 (Alvaro Ferreira) 修士，⁸ 據沙勿略 1552 年 10 月 22 日的信稱：

阿爾瓦羅·費雷拉 (Alvaro Ferreira) 和華人安東尼奧 (António) 一路上身體不適，現在多虧上帝保佑，情況好多了。

另一個傳教人員是中國青年安敦 (Antoine)，即前文的修士安東尼奧：“沙勿略大師準備入華，攜帶一個華人青年作為翻譯，他在果阿學院中長大，名叫聖安東尼奧，後在澳門多明我會住院呆了許多時間。”⁹ 直到 1578 年范禮安還在澳門見到了他。¹⁰ 還有一個是葡萄牙人上川 (Pedro de Alcoceva) 修士，據榮振華的資料，他是在沙勿略死後的 1553 年才到達上川島的，並且以該島為自己的中文名。¹¹

沙勿略終其一生也未能進入中國內地，但他不畏艱險，決意要進入中國內地開教的精神卻極大地鼓舞了他的後繼者。沙勿略根據自己在東方傳教的經驗所提

⁶ 格奧爾格·舒馬赫梅爾《方濟各·沙勿略通訊錄》。轉引自金國平《西方澳門史料選萃：15-16 世紀》，頁 65。

⁷ 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冊，頁 5。

⁸ 榮振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上冊，頁 218。

⁹ Alessandro Valignano, Josef Wicki, *Hitoria del principio y progreso de la compañía de jesús en las Orientaes (1542-1564)*, p. 261.

¹⁰ Luis Fróis, *Historia de Japam*, Vol. I, p. 48.

¹¹ 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冊，頁 7；榮振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上冊，頁 10。

出的“適應”策略被後人奉為典範，並為范利安、利瑪竇等西方傳教士所遵循和發展。此後，便不斷有傳教士嘗試著前往廣州，進入中國內地，拉開了基督教第三次在華傳教的序幕。

沙勿略逝世後還不到兩年，葡萄牙索割船長於1554年與廣東海道簽訂和約，廣東政府批准葡商到廣州及其附近地方經商。¹² 當麻六甲教會得知這一消息後，迅即派葡萄牙人岡薩雷斯 (Gregorio Gonzalez) 神父到廣東：

直到1553年，此時，有消息傳到印度說，中國人想同葡萄牙人息兵議和。事實上也確是這樣做了。接到這個消息後，我就被派到那邊去了。在第一年(1555)，我同7名基督徒一道留在該地，我和其他人都被人囚禁了，直到次年船隻來時為止。次年(1556)，我主又給了我啓示，因此，我使若干中國人皈依了耶穌基督的聖教，我留在這個島上，在島上已經建起了一座茅草的教堂。那些要開往印度和其他國家的船隻來過之後，我還是留在該地，同75名基督徒在一起，我們全體又一次被囚，分別關押在不同地點，互不通消息，中國人向我喝叱，因我留在陸地上，這可能是圖謀不軌。他們囚禁我直到次年(1557)船隻開來之時，我們全體一起獲釋，我又把教堂修了起來，葡萄牙人把房屋修建起來，這樣，他們(中國人)從此認識了我，相安無事了。

我就開始瞭解當地的情況並宣揚基督教，一直不懈地努力使該地的人受益，善於寬宥他們的過失，同他們交往，並讓他們接觸到許多真理。經過一段時間，即12年的期間，我終於在這個名叫澳門的陸地地岬搞起了一個十分大的居民點，有三座教堂、一所貧民醫院和一所慈善堂，這個居民點現已有基督徒5,000以上。¹³

岡薩雷斯神父的信函中，清楚地記錄了耶穌會在澳門建立根據地的過程，而岡薩雷斯神父則是創建澳門天主教傳教基地的第一位神父。值得注意的是，岡薩雷斯神父進入澳門傳教建“茅草的教堂”並授洗75名中國教友時，葡萄牙人尚未正式進入澳門定居，他們尚以浪白滯為臨時貿易據點。直到嘉靖三十六年(1557)葡萄牙人幫助廣東政府平定澳門“阿媽賊”後，廣東政府才允許葡人僑寓濠

¹² 參見湯開建《澳門開埠時間考》，載該氏《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頁93-94。

¹³ 《葛列格里奧·龔薩雷斯神父給胡安·德·波爾哈的信》(約1571年)，載羅理路編《澳門尋根》附錄文獻之12，頁140。

鏡。¹⁴ 1554-1557年間的濠鏡澳還只是允許葡人進入的臨時貿易點之一，而貿易結束後就要撤離。而岡薩雷斯神父是在貿易結束後還留在濠鏡島上，故他們被中國政府派駐在島上官兵兩次囚禁，直到1557年廣東政府批准葡人正式寓居澳門，岡薩雷斯及經他授洗的中國教友才獲釋放。

繼岡薩雷斯之後來廣東海岸者則為耶穌會巴萊多(Melchior Nune Barreto)和多明我會士克魯士(Gaspar da Cruz)。巴萊多神父是沙勿略的同事，他於1555年7月中旬來到上川島。他於1555年11月在浪白濶發出的信稱：“沙勿略去世後不久，中國人就對基督徒放鬆了，也可以到中國其他地方去。”大概在7月底，他隨葡萄牙貿易團一起北上廣州，他先後兩次去廣州，每次都在那裏停留一個月，主要想營救被關押在廣州的葡萄牙人和其他的基督徒。他在廣州並未傳教，亦未能使一華人受洗。其間沒有來澳門的記錄。¹⁵ 多明我會士克魯士神父是於1556年冬天從馬六甲來到廣州，歐洲人寫的克魯士傳記中稱，克魯士是在中國宣講福音的先驅傳教士，並在那裏度過許多年。這是一種很荒謬的說法。據克魯士自己說，他在廣州僅僅呆過幾個禮拜，並沒有任何傳教活動的記錄。¹⁶

1560年，第一批耶穌會會員到達澳門；1562年耶穌會會員義大利人吉爾萬尼·巴蒂斯達·德·蒙特(Giovanni Battista de Monte)和葡萄牙人路易士·弗羅依斯到達澳門；1563年，耶穌會士弗朗西斯科·佩雷斯(Francisco Peres)、特依謝拉(Manuel Teixeira)神父及安德列·平托(Andre Pinto)修士到達澳門。¹⁷ 1563年時，澳門天主教已發展到相當的規模：

我們和準備去日本的神父們要料理在(澳門)這個港口的八九百名葡萄牙人，而且從別的一些港口還有人前來。……我們給他們發表了一份贖罪書，是從麻刺加主教大人那裏帶來的。……在我們這個會所，將有300名葡萄牙人領聖體，另外還有一些在此地另一所教堂領聖體。¹⁸

據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載：

¹⁴ 參見湯開建《委黎多〈報效始末疏〉箋正》，頁49-53。

¹⁵ 《梅爾希里爾·努內斯·巴列托神父給果阿耶穌會士們的信，浪白濶，1555年11月23日》，載羅理路《澳門尋根》附錄文獻之2，頁62-63；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冊，頁11。

¹⁶ 博克塞《十六世紀中國南部行記》之《導言》，頁4。

¹⁷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頁15-16。

¹⁸ 曼努埃爾·特謝拉神父給果阿耶穌會士們的信（澳門，1563年12月1日），載《澳門尋根》附錄文獻之5，頁84。

1563年，澳門至少有8位耶穌會士，人民增至5,000上下，內中有900葡國人及許多本地教民。有歷史家記載當時耶穌會士的日常職務說得很清楚，每8天或每15天，輪流施行各樣聖事一次，向1,000名上下的奴隸講解教理，為孤女或本地教民處理婚姻。……1563年聖主日內舉行慶祝聖女味落尼加 (Ste Véronique) 遊行大會，引來無數中國人民，街上裝飾得非常美麗，聖堂宛似天堂，恭捧聖體在市內遊行，以音樂及舞蹈相伴，燈籠火把共計600餘隻，儀式異常莊嚴。¹⁹

前引岡薩雷斯的信中提到，在他離開澳門之前，已建起了“三座教堂、一所貧民醫院和一所慈善堂”。一般學者均將岡薩雷斯離澳門的時間定在1568年賈尼勞 (Melehior Carneiro) 主教來澳門之後。²⁰ 那就是在1569年以前，澳門已建立了三座教堂，當即花王堂（聖安多尼堂）、風信堂（聖老楞佐堂）和望德堂（聖拉匝肋堂），其中望德堂建立最早，大約建於1557年。蒙塔納 (Montah) 神父稱：“葡萄牙在澳門定居和望德聖母堂建立的時間就是1557年”；郭永亮據1784年10月12日澳門葡人致北京主教的信也認為望德堂建於1557年。²¹ 裴化行稱：

在1565年時，澳門已經有信友5,000名以上，……教友們都是住在聖拉匝勒主教大堂的周圍。耶穌會士柏來斯 (Peres) 及代匝拉 (Texeira) 在1565年得到中國官廳的允許，能在聖安多尼修院左近建造簡陋的會所一處及聖母小堂一座。²²

這就告訴我們望德堂至少在1565年之前已經建成，且是澳門最早的主教教堂。花王堂與風信堂一般認為建於1558-1560年間。²³ 當時除了這三座最古老的教堂，在花王堂的左近尚有一“聖母小堂”及“會所一處”。1564年入澳的葉權記錄澳門葡人時稱：

¹⁹ 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上編，第5章，頁109-110。

²⁰ 羅理路《澳門尋根》，頁139即稱：“到1568年，葛列格里奧·龔薩雷斯神父被若熱·德·聖塔盧吉亞修士召回麻刺加。”但金國平、吳志良提出新的看法，認為岡薩雷斯離澳在1564年，參見金國平、吳志良《東西望洋》，頁81-82。

²¹ 參閱pe Montaha, “Apparatos para a Historia do Bispado de Macau”, in Maria Regia Vele, *Igrejas de Macau*, p. 14. 郭永亮《澳門香港之早期關係》第5章，頁46。關於三座教堂的具體始建時間，各種資料差異甚大，本處不作辯考。潘日明神父認為最早的三座教堂為聖母瑪利亞教堂、花王堂及風信堂均在1560年前建成。

²² 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上編，頁126。

²³ 郭永亮《澳門與香港早期關係》第5章，頁63及68。